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 •
- “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二) •

〔编者按〕在全国上下庆祝建党百年之际，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最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中共党史党建”列为“法学”门类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代码 0307），既为再次启动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建设之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有望从学术体制、资源支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继续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转型。可以预计，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议题，也将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鉴于此，本刊再次设置“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继续从多方面探讨和推进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

在守成与开新中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

郭 若 平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史党建”将成为法学门类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这对党史学界来说是一桩学术盛事，对党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对党史学术期刊从业者来说更是一次莫大的机会与考验。回溯百年来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飞速发展，可以明显感觉到，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是党史学界几代研究者、党史知识几代教育者和党史期刊及其出版机构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的期待与冷暖，识者自知。就学术期刊在繁荣和推进党史研究的作用而言，从中央主管单位主办的党史学术期刊如《中共党史研究》，到地方主管单位主办的党史学术期刊如《党史研究与教学》等，都充分体现了支持与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发展的阵地意识，在促进党史研究发挥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方面，也体现了当仁不让的担当责任。目前，在党史研究即将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下，党史期刊如何在下一个百年再造新的学术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学术力量，应该是办刊人需要认真谋划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在党史期刊从业 30 余年，感到党史期刊应当办成什么样学术风格的专业刊物，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对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承接学术传统下的学术开新

学术期刊是学界天下的公器，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园地，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发挥着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功能。因此，谈论党史期刊未来的发展，并不在于党史研究是否为一级学科，而在于应当厘清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基本性质。只有厘清党史研究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党史期刊才有可能据此推动一系列研究朝着学术规范方向发展，更好地形成刊物与研究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升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认知，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视野，能够被纳入分析视野中的历史现象，自然都有可能生成不同的取舍与判断。但是，无论分析视野如何变换，大凡发生过并

^{*} 本文是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概念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核心政治概念综合研究”（20ADJ008）的阶段性成果。

影响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史事现象，都不能不成为需要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无论这种对象曾经有过多大的变迁起伏，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中共的历史长河已淌过百年，至今还在持续向前奔涌，向着充满期待的未来进发，希冀在新时代以及未来百年中更上一层楼。对这样一个百年政党历史发生的各种史事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发展变迁的学问，经历了专业理论建构与知识积累的长期历史，其中形成的学术经验规则与理论思想资源，使其具备作为一门严格学科资格，这个定位无论从经验性的观察还是从学理性的分析来看，都有知识体系内在演变的逻辑依据。很显然，既然党史研究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变迁的历史，那么，在史学范畴的学术场域展开研究就无可非议，尽管这种研究是对政党政治活动史的研究，带有政治导向性。因此，再度持续争议学科性质的定位实在无甚意义。但是，无论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意图，党史研究毕竟与一般历史研究并不完全相同，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现实的学术规则运用上，党史研究还必须担当政治教育的功能，虽然一般历史研究也存在教化的意图，但党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政治导向的意义。以此而论，如何在一级学科范畴中，一方面既保持党史研究业已形成的原有学理共识，守成党史研究的传统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因应现实需要的前提下有所开新，涵育党史研究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象，拓展党史研究的知识疆域，恐怕应该成为党史研究未来学术建构的目标，也应该成为党史期刊主动的引导职责。

二、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统一

涵育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象，意味着需要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风格”一词原本是一个艺术概念，是对艺术作品独特性的典型风貌的描述，其后演化为对某种事物或行为呈现的独具特色的解释。学科风格就是一个学科蕴涵的独特面貌和学术精神。对于党史研究来说，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撰述形式上——尽管撰述形式很重要，它能导引人们对其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风格的灵魂在于它的内在精神特质。党史研究作为一门研讨中共历史发展的学问，它的精神特质应当如何定位，或许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解释。但是，就中共作为一个现代型政党的建立而论，它的政治性质，早在中共创建时即已宣布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①。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进程进行叙述与解释，百年来已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专门学问，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党史研究到底具有何种学术特质的争议，尽管其中蕴涵着种种研究考量，却也因此而持续缠绕着研究者的致思神经。

实际上，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特征考察自身的学术理路，并在中国语境下的学术之林讲究自己的学术风格，倒不必纠缠归类于何种学科性质而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党史学科不需要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而是说在目前虽然党史研究即将被确定为一级学科的前提下，有关这一学科的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不必过于纠缠它的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学科风格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恐怕还胜于它的归类和定位，因为学科风格显示的是一门学问的独特性。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发展的学问，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虽然不应排除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但它的学术思想底色，应当显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风格。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论及马克思与历史学的关系时特别强调：“马克思对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综合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他所勾画或暗示出的、人类历史由原始地方自治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态，一个是他对与过去的特殊方面、特殊时期和特殊问题相关的事物的具体研究。”^②显然，这里概括的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强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70页。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调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应当建立在综合理论（唯物史观）主导的基础上，既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也进行总体的历史把握，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将这种观念要素和研究特征融合在党史研究之中，形成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统一整体，正是体现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术风格。

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存在两种研究观念的分野：一种研究观念是将党史研究当作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种是将其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这两种研究观念实际上都涉及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特征。党史研究的基础固然属于历史学范畴，这是学科意义上的定位，没有这种历史学科定位，党史研究实际上无法展开，即便展开也不属于研究中共的历史。既然如此，党史研究就不能不考察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历史环节，而每一种历史环节都是“特殊”的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存在并不能涵括中共历史的整体性特征，因而，研究中共历史就不能不对“特殊”环节的历史逻辑进行综合把握，以显示中共历史发展的总体发展形态。但是，简单地将党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恐怕也不符合党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从总体形态上对党史进行分析，实质上就是将中共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观照下进行综合理论分析，唯物史观仅是党史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史观原则，因而它不是在替代党史“特殊”环节的具体分析，尽管党史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一般历史学追求细节考索的基本要求。以唯物史观为导向的党史分析，是一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取向的理论分析。就此而论，党史研究显然不能回避理论分析的介入，尽管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在历史分析框架之下展开的研究，应当正确地看待党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的辩证关系。

由此可见，既然党史研究不能不涉及政治理论分析，这就要求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追求细节史事的考察上。具体史事只是党史研究的一面，充当着党史叙事的结构要素，并且是党史整体性结构的构成要素。因此，没有具体史事的存在，就不可能形成党史叙事，也就没有文本意义上的党史书写。通常所说的党史研究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的。党史研究的另一面，则在于它的理论阐释，它发挥着对具体历史叙事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再真实可靠、生动活泼的历史叙事，都是历史语言的分析表征，诚如史学理论家所说：“真正的叙述是以分析为前提的，历史并不是直接的。”^①叙事的“史事”并不等于曾经发生的“史事”，衔接双方的桥梁只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理论分析。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党史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词。党史研究的理论分析侧重于中共历史叙事的价值评价与意义判断，这种侧重点使得党史研究不能不引入相关的历史理论，才足以满足理论阐释的需要。中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其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首要选项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尽管其中并不排斥人类知识史上所创造的历史哲学遗产。

显然，党史学科的学术底色，应当是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统一体。党史学科的这种学术特征，既是守成的，也是开新的。说“守成”，是因为它保留了党史研究传统的史事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特色；说“开新”，是因为党史研究的学科特征，应当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分析特征，在史事叙事与理论阐释的整体研究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学术风格。如此一来，作为一级学科的党史学科建构，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标识下，发展出既符合党史研究历史叙事的学术属性，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阐释特征的知识形态，这是一种在守成与开新的统一体中形成的新知识形态，即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知识形态。

三、开出马克思主义学术新气象

赋予党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并非源自党史研究需要理论支持的外在力量，而是取决

^① [法] J·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研究的指导性意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当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涵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历史政治意识、历史观察视野等诸多方面。对于这些方面的总体哲学基础，马克思这样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恩格斯则补充说，对于一切历史科学来说，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它揭示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②。但这不能被孤立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都做过辨析^③，既承认历史发展不存在单一的方向与路线，也承认社会上层建筑所有方面同样对历史进程发挥特定的作用。因此，正如史学理论家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提出问题 and 假设，而不是作为提供现成答案的工具”^④。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原则，党史研究坚持这个核心原则，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具体而论，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无论是事件史研究抑或思想史研究，都不应舍弃或忽略中共历史赖以生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实践作用；无论是综合性的历史述论抑或是个别性的史事分析，都不能撇开中共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趋势而生产独立结论；无论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抑或借助域外分析模式的研究，都应当充分考虑赋予研究对象的适用性与可能性；无论是文化现象层面的考察抑或是符号表征层面的研究，都应将其视为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存在；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处在“互为”关系之中，共同左右着中共历史的变化，这种历史变化的动力来源，依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唯物史观强调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⑤。

中共党史研究如果要开出新的研究格局，形成新的学科风格，吸纳中外优秀学术传统固然很有必要，这是继承与开新的必要资源。但是，已有的党史研究学术传统，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可是并没有在学科范畴层面真正建构起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以至于在政治学或历史学范畴中争执学术疆域。这似乎到了该变换思维方式的时候了，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来创新党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学术话语、学术范式，显然是党史一级学科发展的急迫需要。

四、党史期刊的学术担当

建构党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当然需要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础、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观念的党史研究专业人才，这在“中共党史党建”立为一级学科之际，显得更具紧迫感。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建立推动和保障建构党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学术机制。机制性的推动，是党史学科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关键性力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级党校等无疑是学术机制得以运转的制度载体，各种类型的课题设置也具有发挥研究指南的功能，但最能引导学术风向的载体，恐怕专业学术期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养成，需要以上几个方面共同发挥合力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党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形成具有了制度性的推动与保障。

党史期刊承担着刊载党史研究成果的任务，具有发挥正确政治导向和规范学术规则的功能。尤其像《中共党史研究》这样的权威性期刊，更具引领全国范围内党史研究学术风向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党史研究学术成果，几乎覆盖了中共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7页。

④ 〔美〕S.H.里格比著，吴英译：《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5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面，为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认为，党史学术成果必须进入学术共同体以接受检验，必须在学术领域传播以扩大知识的影响力，必须转化成为现实服务以体现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就对党史期刊提供了引领学术走向的机遇。如何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党史研究范式，从理论高度发挥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和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显然可以在其中发挥引领学风的作用。尽管作为一份刊载党史研究学术成果的重要期刊，并不能也无须左右党史学界选择的学术问题，但能够标识自身办刊的学术意图和学风趋向，倡导党史研究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塑造期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象。对此，该刊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显然已有不菲的建树，如设置“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栏目，反映了追踪中共党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的历史轨迹；设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学术逻辑和文化意蕴”栏目，试图在学科机制上，将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进行融合，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研究的内在学理关系。还有许多具体研究实例，此处不遑举证，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总体观、求实观、辩证观等，都已在刊物中得到显著体现。尤其是整体性地把握党史的全景发展受到特别的关注，该刊试图提示，如何辩证地、整体地考察与分析党史，是避免党史研究出现片面性、落入碎片化的认识论基础。正如该刊曾刊文强调的那样：“‘整体性’的研究思维实际上主张将特定党史问题的基本历史内容及其评价等回置于所处的全部脉络和体系当中，着力发现和构筑与其相关的所有历史元素的整体性认知框架。”^① 正确的党史观，就是一种建立在整体性辩证理解党史基础上的历史观。

为了建构党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中共党史研究》有必要加强刊发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探讨文章，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应当着重刊发引导分析思维和研究路径的研究成果，这样才有益于党史学界投入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学术实践。在中共下一个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共党史研究》既要守成又要开新。守成就是要保持早已形成并且持续发展的党史研究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已被证明具有研究功效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也是党史研究今天与今后得以持续拓展的知识规范性基础；而开新则是在党史研究已有知识积累传统基础上，呼应新时代理论发展的要求，开发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党史研究新境界，尤其是要开出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的党史研究新气象，助力党史一级学科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建构。

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来说，对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构的新境界和新气象的学术追求，可以成为今后办刊持续关注方向，其中的顶层设计关注如下问题也许恰当：第一，考虑到建构党史一级学科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复杂性，应当加大刊载探索马克思主义史观与党史研究理论及其方法内在关系研究成果的力度，为推进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形成提供元典理论知识基础；第二，从强化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出发，刊载能够体现中国话语特色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国化”特征应当成为党史学科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关键要素；第三，从党史研究学术史角度出发，刊载党史领域蕴含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党史学术体系构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知识资源；第四，从学术交融的需要出发，刊载能够吸收中西方现代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且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下进行分析性批判与吸纳，从多学科层面丰富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内涵。以上诸方面，主要是针对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基础要素而论，挂一漏万，有待通盘思考。显然，一种学术风格的发展成型，无论在理论观念还是在研究技艺上，尚有诸多具体学理细节需要长期讨论，《中共党史研究》有必要给予关注。

当然，如何从党史一级学科建设要求出发，真正建构党史研究的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

^① 吴志军：《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格，至少到目前为止，尚处于探索与讨论的阶段，应当引起党史学界的持续关注。显然，凭借《中共党史研究》这样一份重要期刊单枪匹马地努力，或许不易在党史研究领域广泛地促成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形成。因此，有必要倡导地方性党史期刊也加入这一理论工程中来，共同建构党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思想氛围和文化格局，无论在研究导向与学术观念方面，或在具体研究实践方面，共同倡导党史研究体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主导的学术实践，共同倡导建构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党史一级学科体系，在继承党史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基础上，开出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新气象，践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精神。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什么是“大党史”

李 金 铮

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学界，近几年时有听闻“大党史”之说。然此说始于何时，似无可考。对此略有解释者，为2020年11月“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开设时的“发刊词”：“我们将继续奉行‘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栏目设计和勤勉组稿，努力覆盖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核心主题，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宏大历史画卷。”^①所谓努力覆盖或全面展现党史领域，大致可理解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扩大。从“继续奉行‘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这一表述来推断，在此之前应该有类似提法，但笔者尚未找到公开发表的信息。经调查和了解，其实早于21世纪初就已有前辈学者在不同场合谈到“大党史”，主张扩大党史研究领域，和“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党史工作部门及其组织的会议、报告和文章中也出现过“大党史”的提法，但和前述指向有所差异，而是“‘大党史’工作格局”，指党史研究、党史工作部门、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协同工作机制。

正因如此，“大党史”至今仍是一个认识尚待深化的概念。笔者认为，应从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学术共同体等多方面，对此作出专门阐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党史”的显著特征是“大”，这就暗存着在其出现之前一定有一个传统党史窄化的前提。所谓“大”，应具有独立的、全面的、多元的意涵。

何谓“独立”？简单说，指党史研究由原来的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只有独立为一级学科，才有利于“大党史”的确立和发展。当然，独立仅具相对意义，而无绝对意义，一级学科之上还有门类归属。对此，学界早有共识，只是关于归属哪个门类，见仁见智，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笔者也曾发表文章，主张党史学科应归属历史学，并阐述诸理由^②。目前，“中共党史党建”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仍归属法学门类。应该说，从党史学科的特殊性而言，这并非令人意外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一级学科的建立将极大地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这是无疑的。不过，笔者依然坚持己见，即便门类归属已定，也丝毫不能削弱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正是考虑到此，笔

^①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让学术之光继续照耀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刊词（2020年11月18日）。

^② 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